



《沈从文九讲》，张新颖著，中华书局2015年9月第一版，40.00元

理解沈从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沈从文去世后，妻子张兆和着手整理他的生前文字。这本该是借由文字和丈夫的一次重逢，意外地是，随着越来越多的遗作被发掘，张兆和却渐渐意识到自己过去从未真正理解丈夫。她在《从文家书》的后记中坦言：“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越是烂纸堆里翻到他越多的遗作，哪怕是零散的，有头无尾的，有尾无头的，就越觉得可贵。太晚了！”

在沈从文去世前一年，沈虎雏将誊写好的《抽象的抒情》交给父亲审阅。沈从文读完，却感叹“这才

《沈从文九讲》没有延续通常的文学史叙述，将沈从文简化成书写乌托邦式的中国乡土、具有田园抒情诗人气质的文学家，而是带领读者去了解作为文学家、思想者、实践者的沈从文的一生，并将他的挫折、坚持与退守置于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的时空加以理解。

《沈从文九讲》：连缀沈从文一生的蒙太奇

■刘媛

写得真好”——显然，老人已经忘记了这篇文字。《抽象的抒情》是沈从文1961年在青岛养病前后写成的。那一年，他已经开始准备写作《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部无论对于他个人还是对于整个考古学界都意义重大的著作；而青岛，则是湘西之外，沈从文最为留念的地方，因为在那里他度过“一生读书消化力最强，工作最勤奋，想象力最丰富，创作力最旺盛”的三年，写作了《从文自传》《八骏图》等作品，并开始酝酿代表作《边城》。由此，不难推知这篇文章的分量。然而，二十多年后，八十五岁的沈从文已经将生命中这一重要的片段遗忘了。

沈从文晚年有太多令人唏嘘的片段，许多片段伴随着老者的眼泪。整理家信时的眼泪，答记者问时的眼泪，听闻老友离世时的眼泪。然而，比眼泪更让人唏嘘的是遗忘。也正是这次遗忘提示了我们一条为许多人忽视的理解沈从文的路径——“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抽象的抒情》题记）。

复旦大学张新颖教授显然留意到了这次遗忘。在新近出版的《沈从文九讲》一书中，他将这条路径概括成从沈从文理解沈从文。全书以此为基本方法，通过九个相对独立

的章节，讲述了沈从文一生创作与实践及其文学传统在当代的回响。值得一提的是，该书的诸多篇幅也是张教授为本科生开设的“沈从文精读”的课程讲稿的底稿。作者以于他个人还是对于整个考古学界都意义重大的著作；而青岛，则是湘西之外，沈从文最为留念的地方，因为在那里他度过“一生读书消化力最强，工作最勤奋，想象力最丰富，创作力最旺盛”的三年，写作了《从文自传》《八骏图》等作品，并开始酝酿代表作《边城》。由此，不难推知这篇文章的分量。然而，二十多年后，八十五岁的沈从文已经将生命中这一重要的片段遗忘了。

《沈从文九讲》没有延续通常的文学史叙述，将沈从文简化成书写乌托邦式的中国乡土、具有田园抒情诗人气质的文学家，而是带领读者去了解作为文学家、思想者、实践者的沈从文的一生，并将他的挫折、坚持与退守置于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的时空加以理解。作者把沈从文的一生分成三个阶段：从一开始创作到1936年《从文小说习作选》的出版，是文学阶段；从30年代中期到40年代结束，是从文学到思想的阶段；1949年之后，一直到他去世，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实践阶段。三个阶段分别对应文学家、思想者、实践者三个形象，而“贯穿起这三个形象，大致上可以描画出沈从文这样一个比较特殊的人、比较特殊的知识分子，在20世纪中国巨大变动时代里的人生轨迹”。

又如，作者在分析沈从文在1949年后的文学创作时，没有止于

这些作品，而是通过与同时期的书信、检讨、自白等“并非有意识地当作文学而写下的文字”的对照，得出后者“反倒保留了比同时期公开发表的文字创作更多的文学性”的结论。张新颖教授认为，“在特殊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下，文学作品的公开发表机制往往是意识形态审查和控制的方式”，对比公开发表的作品和书信，“我们会感受到一种堪称巨大的反差，感受到书信所表露的思想、情感的‘私人性’与时代潮流之间的紧张关系。在特别时期，正是在‘私人性’的写作空间里，‘私人性’的情感和思想才得以以文字的形式表达和存在，才保留了丰富的心理消息”。可见，对沈从文而言，书信是一个特殊的私人写作空间，不能简单地说他作家生涯到1949年就彻底结束。

分析沈从文土改时期的一封信时，张新颖教授甚至直接援引同时期其他的书信来解读信中夜读《史记》的内容。这封信中关于《史记》的内容有一千多字，但引用其他书信的文字大大超过了这个数字，并且全篇所有的征引文字都出自沈从文之手。筛选、剪裁、拼贴，无疑是简单到极致的文字处理法，但张新颖教授直言，“在理解沈从文的所有方式中，从沈从文来理解沈

从文是个基础，就目前而言，这个基础工作仍然没有做好”。

“从沈从文来理解沈从文”虽说是“基础工作”，却对研究者有着极高的要求。在某种程度上，张新颖教授的角色近乎于剪辑师。如何从五百多万字、三十二卷本的《沈从文全集》中“剪辑”出意味深长的生命片段，考验的不仅是对文献的熟悉程度，更是研究者的个人洞见。

张新颖教授敏锐地指出，许多读者认为沈从文的景物描写清澈透明，很“表面”，缺乏“深度”，但这种看似挑剔的“批评”其实道出了沈从文的“好”。他先从《湘行书简》选取了这样一段文字，“我就是个不想明白道理却永远为现象所倾心的人，我看一切，却并不把那个社会价值加进去，肯定我的爱憎……接近人生时我永远是个艺术家的感情，却绝不是所谓道德君子的感情”。继而阐发出“‘深度’是‘焦点透视’产生的，要产生出‘深度’，一定要有‘定见’‘定位’‘定向’‘定范围’，也就是说，一定要把‘眼光’所及的东西对象化，用‘眼光’去‘占有’景物，景物物屈从于‘眼光’，以便‘攫取’景物而产生出解释的‘深度’。沈从文的‘看’，却不是‘占有’式的，他（指沈从文）虽然未必达到庄子所说的‘使物自喜’的境界，却也庶几近

之，因为有意无意间习得了‘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的观物方式”。

而回溯《边城》从酝酿到落笔的过程，作者更是将《从文自传》中的渡筏、《新题记》《水云》《关于云南漆器及其他》《民国二十二年青岛遇见的为家人“报庙”的女孩》《湘行散记·老伴》中绒线铺的女孩子等种种场景调度、连缀在三四页的篇幅中，还原了《边城》传奇背后的一些本事。而这些经验、记忆、情绪和思想的纠缠正是一位年轻作家的敏感心性的写照。如此读者更加理解作品中“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无奈与悲哀。

或许，我们可以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沈从文九讲》呈现了张新颖教授细心剪辑的九个生命片段，而这九个片段，连缀成作家一生的蒙太奇。将一部学术研究著作与电影画面类比，似乎有些牵强。但耐人寻味的是，导演侯孝贤和贾樟柯都曾表示，自己的电影受益于沈从文的作品。这样说来，蒙太奇的类比是有些道理的。《聂隐娘》那些风吹影动的空镜头，《小武》里那些偶然进入镜头的路人，和《沈从文九讲》中“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的方法一样，都是读者对沈从文的文学传统的回应。

书中的记录都是真实发生在袁敏和儿子生活之中的。“我自己的定位是纪实文学，写给有共鸣的父母来看。出版社考虑到销售问题，把这本书按家庭教育类来打造。没想到出版之后，最喜欢《蒜头的世界》的却是孩子”。

个体匹配的教育，只有家长能够完成——快乐妈妈袁敏的教育经

■本报记者 郭倩

事，写起来是调侃的、幽默的。”大概是因为这些故事已经被反复讲述，袁敏的创作异常快速、顺利。为儿子化名“蒜头”，满足了他“不能用真名和照片”的要求。

全书分三个部分：“蒜头与小动物”“蒜头的商基因”和“蒜头的成长”，分别讲述蒜头小学和中学阶段发生过的趣事，在当时看来都是让啦啦（妈妈袁敏）头痛的冲突、应接不暇的突发状况。

书中的记录都是真实发生在袁敏和儿子生活之中的。“我自己的定位是纪实文学，写给有共鸣的父母来看。出版社考虑到销售问题，把这本书按家庭教育类来打造。没想到出版之后，最喜欢《蒜头的世界》的却是孩子，在学校引起了比较大的反响。”袁敏认为，中国的学校教育都是集体教育，不可能针对每一个孩子进行个体匹配的教育，对个体的了解和培养只有依靠父母才能完成。但是如今的家庭中，孩子与父母之间是十分隔离的。家长不知道孩子在想什么，孩子对家长不愿意说心里话，这个状态十分糟糕。

最近常常去学校办讲座，袁敏发现：“中国父母对孩子成功的观念非常狭窄。成功是多途径的，但是中国的父母更看重考上名校、出

人头地。孩子从学校出来，双休日又进入各种辅导班兴趣班，实际上还是课堂。孩子是很压抑的，他们觉得父母不了解自己，对父母关闭心灵。父母会觉得孩子叛逆、难教育，而且很多父母用高压政策要求孩子必须做什么，结果肯定是两败俱伤。”

袁敏说，自己想要打造一个“没有围墙的学校”：“我想告诉孩子，行走也是一种阅读。今天的孩子没有多少机会可以接近大自然，但是很多知识的获得应该走到山水中去。我想告诉孩子们，外面的世界太大了，不要局限于学校和课本。”

接下来袁敏还有两本“蒜头系列”作品的写作出版计划，一本“探秘亚马逊”，一本“蒜头在南极”。这两部作品将会延续“蒜头”这一文学形象的故事，清晰定位为少儿文学。真正的蒜头已经长大，故事里的蒜头还是一如既往。“亚马逊是最近我和儿子一起去的，我们聊了很多，他从另外的视角给我很多启发。明年三月份还要去南极，也会写。这两本书都不是纯粹纪实，我会继续写蒜头的故事，希望蒜头成为少年儿童喜欢的朋友。”

或许袁敏的接受度的确比一般人更宽，使她更能理解年轻人的世界。从1998年开始，袁敏做七年

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评选，推出了一批少年写作精英，还力排众议出版了韩寒的《三重门》。《蒜头的世界》能受到孩子的喜爱，让袁敏感觉意外的同时也很开心。“去学校讲座时我会留一点时间跟孩子互动，总是被要求留下微信、微博，很多孩子会给我发微信、微博留言——‘我又遇到了烦恼’……”

袁敏说，收到最多孩子反馈的，是书中的那篇《寻找100棵大树》。蒜头偷偷溜进学校广播室违规使用电脑，连带啦啦也受到了老师的训斥。啦啦带着被学校停课一周的蒜头回家之后，忍不住劈头盖脸地斥责儿子。没想到蒜头凶神恶煞地回应：“妈妈，我已经很受伤了，你要是再这么不问青红皂白地说我，我只有去死！”啦啦再三冷静，最终请了假，送儿子去大山里住了一个星期。与世隔绝的一周生活结束，啦啦担心的事情自动解决了：蒜头主动写好了检查，重返校园。他说，我想明白了，我还需要读书，那么就要遵守这个社会的游戏规则。“很多孩子因为这个故事给我留言。前段时间仅是被报道出来的，浙江就有7个孩子自杀。那次，蒜头也说要自杀。很

多父母遇到过这种情况，总是通过打骂让孩子按规矩行事。而实际上，让孩子短暂离开一段时间，让他自己想明白，比家长握着教育一百句都管用。”袁敏感慨道。

读过《蒜头的世界》，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家庭教育首席研究员孙云晓撰文说：“现实生活中，为什么许多教育失败了？不一定是教育本身不好，而可能是匹配度不够。所谓匹配度，就是因人而异因材施教。蒜头是一个精力过人、个性顽强和勇于挑战的孩子，如果按照传统的教育来要求或限制他，必然两败俱伤。蒜头父母的成功在于，总是把理解和尊重孩子作为爱的前提，总是能够发现孩子出格行为中的合理或积极的因素，因而总是能与孩子沟通。从情商或社会情绪培养的角度说，先是共情即理解孩子的情绪，后是划界即分清是非对错承担责任。这样一种理性的教育，才可能培养出既有主动性又有自制力的孩子，而主动性与自制力是健康人格的核心。”袁敏十分认同这一看法。

对于孩子的教育原则，袁敏指出了最重要的三点。“一是快乐，这对孩子是最重要的。有一次讲座时，一个女孩提问说，她想做音乐老师，可父母希望她做居里夫

人。我问她，你为什么跟爸妈说自己的想法呢？她说，我不敢。我建议她把袁敏的这首诗背给爸妈听——‘只要你快乐，你就没有生活过’。我觉得快乐对孩子是最重要的。第二，家长不能居高临下，摆出对孩子教育的姿态，而要成为孩子的朋友。成为朋友才能走进他的内心，走进内心才能了解他需要什么，想干什么。这时候说的话才有效果。第三，孩子兴趣点在哪里，强项在哪里，家长一定要了解。而不要以自己想要孩子做什么，取代孩子自己的追求。”

此外，袁敏认为家长应该引导孩子养成阅读习惯。“阅读对孩子真是太重要了，又太需要家长的引导了。我发现，一提起网络上的连载小说，热门网文，很多孩子都看过。但是读经典的孩子不多，提起来几乎没有没有人知道。孩子永远把手机抱在怀里，长期阅读快餐式的、碎片化的东西是不行的，也许会有一些阅读快感，读完却没有积淀下来的东西。家长要引导孩子阅读经典，选择好的版本和译者。”在袁敏的少年时代，是一本从图书馆偷偷拿出来的《金蔷薇》伴随她走过了文化沙漠的文革时期，引导她走上了文学道路。有时候，一本经典，或许会对人的一生产生影响。

在这些小说的细节里，哪怕是人性的幽暗里，依然可以看到城市文明中的对个体的尊重，以及对个性生活的赞许。

小说里的欧洲日常生活

■赵瑜

既与中国有相近的地方，又有文化上的细节差异。这真有趣，通过《欧洲最佳小说II》，我们进入欧洲的日常生活，这样的旅行，有着别致的风情。

城市给了我们物质，同时也给了我们疾病和隐喻。欧洲最佳小说的作者里，关注城市现代疾病的人果然有不少，看看这标题：《傻子奥古斯特的哀伤》《逻辑癖互诚协会》《失语症》。

“逻辑癖”是一个夸张的指代，在这篇小说里，主人公是一个逻辑癖患者，他的做法是这样的：“我上床睡觉前将我的衣裤一一摆放到我的座椅上去的严格次序，每天早晨我把牙齿挤到牙刷上去的精确量，同样地我是如此精确地把厕纸折成特定形状来擦屁股……”不必引了，这厮已经疯了。这些因为过于闲适而将强迫症和热爱生活搅在一起的现代病人，并不独独在欧洲产生。但是，欧洲的小说家们捕捉到了这一点，将他们复制粘贴到小说里，那么具有普世的指向和比喻。《逻辑癖互诚协会》的作者，阿明·席玛吉是爱沙尼亚人，生于1969年的他是一个精力旺盛的企

业家，也热爱写小说和拍电影。他的日常生活小说里定然得到淋漓的展示，不知他本人是不是真的有逻辑癖，但是他的这篇有关逻辑癖的黑色幽默小说，差不多将爱沙尼亚的一个小角落的生活给我们拆开了包装。

给我们用小说的模样提供了法国生活纪录片的小小说家叫作玛丽·达里厄塞克，这个同样出生于1969年的法国女作家有着出色的语言能力。二十七岁时，她的《母猪女郎》一书已经轰动全世界。她的短篇小说《乘龙快婿于尔根》有着与众不同的艺术价值。

这篇小说几乎是一台舞台剧，作者用近乎艺术家的气质叙述了一个女摄影家和寡妇母亲的生活切片。如果将这部小说的字体标成不同字体和字号，那么，我相信，一部成熟而有趣的舞台剧本便诞生了。

玛丽·达里厄塞克的叙述能力非常强，她这样将小说的主人公推到了镜头前：“我是摄影师，从拍时照片开始我的职业生涯，后来则更多地转向肖像摄影。我喜欢拍怀孕的妇女、水果、动物和山洞。不消说，这很让人愉快；同时，我想抓

住隐藏在事物下面的东西。我也不清楚那是什么，或许是它们的某无常的东西。”

这种叙述将作者笔下的人物与作者本人有些重合，通常情况下，小说家总喜欢塑造远离自己最近的人物和生活。相信作家玛丽·达里厄塞克身边有不少摄影家朋友。

小说讲述寡居的母亲养的一只猫丢失了，哭着给自己的女儿打电话。女婿于尔根总是能第一时间体会母亲的心思，和女儿放弃了休假，回到母亲身边安慰母亲。

这种日常的生活细节，放在中国也是极其常见的。寡居的城市老太太丢了一只猫丢了，那就是和孩子丢了一样。然而，同样是猫丢失了，故事的走向却是差异巨大的。在玛丽·达里厄塞克的笔下，母亲找到了猫的尸体后，决定将猫葬在一个动物公墓里，还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小说的结尾非常荒诞，但是关于寡居的老太太以及摄影家女儿的关系，以及对待动物的态度，都有着浓郁的法国文化。如果有人将这篇小说改编成一个多幕话剧，那一定是一个叫座的剧本。因为，这篇小说写了人类的孤独。小说

里，各种生活现场都是法国式的，有着浪漫的艺术气质。但是，小说里的母亲的孤独，却是全人类的孤独。小说家将孤独写得深刻又独特，让我读了两遍，每一遍都有不一样的收获。

欧洲80后女作家玛嘉·罗格维克是克罗地亚人，这个报社文化版记者出身的小说家所学的专业是妇女研究，所以，她的小说也关注女性自身的生活。在《欧洲最佳小说II》中，她的小说《查拉特卡》是对女同性恋者的一篇细微专题介绍。这篇唯美的同性小说不仅写个案的孤独，还写了克罗地亚人的自然生活。主人公和查拉特卡缠缠一个晚上之后，她往城市的中心走，发现因为个人生活中的一个点变化了，生活现场也变化了。小说家是这样写克罗地亚城市的细节的：“我没有回自己的公寓，而是穿过铁路，去了市中心。早晨八点钟，城市显得格外陌生，陌生得几乎会迷路。我都不记得上次是什么时候起得这么早。一切是那么有趣：十几岁的孩子背着画满涂鸦的背包，圆鼓鼓的冬瓜，奔跑着赶电车，下眼皮布满黑圈的女人大

步跨向自动扶梯，无精打采的眼睛盯着胖报贩子手里挥动叫卖的报纸不放。再远一些，退休的人们提着帆布包从拥挤的电车里下来。到处飘着咖啡的香气。”

在这些小说的细节里，哪怕是人性的幽暗里，依然可以看到城市文明中的对个体的尊重，以及对个性生活的赞许。

在《欧洲最佳小说II》这套书里，不论是热衷于讨论生命哲学的50后或60后作家，还是用现代视角书写城市生活片断的70后和80后作家，他们区别于中国小说家的最为显著的一点是：他们喜欢在日常生活里展开对人生的反思。他们从不会将小说写成传奇，他们用近乎摄像机记录下最为平和的对话，然而，当我们沿着这对话向城市生活的纵深处行走时，我们会发现，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发现了美与丑，自由与约束，反抗与绝望。

相比较中国当下，天天有传奇和奇谈发生的温度偏高的社会生态和城市剧场，我们的小说家过于缺少深入日常生活的能力了。我喜欢欧洲小说家笔下的日常生活，以及日常生活中浸透了的最为深刻的思索。



《欧洲最佳小说I》，亚历山大·黑蒙主编，李文俊等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3月第一版，118.00元

小说和现实生活的关系十分复杂，多数作者都会将小说里镶嵌进自己的行走或饮食感受。所以，阅读小说，基本上也阅读了写作者个体的日常生活。

在《最佳欧洲小说II》这套书里，因为作者年龄普遍年轻的缘故，阅读他们的小说作品，几乎是在看欧洲现代生活的纪录片，那些贴近欧洲当下生活的细节通过作者的小说情节铺展开来。有时候，我常常想，如果将这篇人物剪掉，将故事的转折及高潮剪掉，那么，只剩下理发店、超市、机场和银行等生活现场，而这些生活现场